

英 拾 林 兵

王 中 兴 陈 朝 鲜

7

公元1632年—清末



兵林拾英（七）

（全七册）

公元1368年——清末

王中兴 陈朝鲜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静一胶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字148千字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天津）第一次印刷

印数1——31000册

ISBN 7-5065-0230-5/E·145

统一书号：5185·177 定价：1.40元

前 言

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传说时代到辛亥革命，据不完全统计，曾经发生过3791次战争。这些战争虽然不可避免地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破坏，但多数战争却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又造就了许多著名的军事人才。他们当中，有的精于算计，坐筹运策，奇谋迭出，非常人所能及；有的长于用兵，挥师百万，千里求战，所向披靡；有的善于治军，体恤士卒，纪律严明，齐勇若一；有的豁达大度，折节容下，任贤使能；有的居功不矜，谦退不伐；有的驰骋沙场，手不释卷，笃志好学；有的身先士卒，爱兵如子，推诚相待，忠勇不贰。但是，也有韬略满腹，却失于骄恣，或败于不虞；或挟嫌误军；或徇私辱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研究和总结历代军事人才的成败得失，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历代繁若群星的著名军事人物，他们进步的军事观点、治军主张、科学的指挥艺术和谋略思想，都是我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认真研究历代军事人物的实践经验及其成就，总结他们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对于我军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对于全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都是一项不可或缓的重要工作。历史是人类进步的一块“跳板”。这项工作，既是发展我军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的

需要，也是培养造就新的军事人才，帮助我军指挥员提高指挥艺术，加强谋略训练的基础工程。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利用业余时间，从我国丰富的历史典籍中，采撷了一些发人深思，饶有趣味，且寓有启迪和教育意义的有关兵家定谋用计、任人命将、治军作战、品德修养等方面的片断，并从军事斗争的角度略作议论，汇集编写成这套《兵林拾英》（从商代到清末），分七集出版，以飨读者。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为了便于读者作进一步探讨，全书各篇均按事件发生的年代顺序编排，在目录中标明了每个故事的中心人物，以便读者查找。选材注意了它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力求写出情节，以引人入胜。行文除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古语原文照搬，不作诠释外，其余均用现代汉语表述，并力求做到简洁、准确、形象、生动。对古代地名的注释，除个别以国家新近公布的标准地名为准外，其余均从中国地图学社197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关于古今地名的标注。

我们才疏学浅，囿于阅历和水平，书中各篇所作的议论，所引用的材料，虽然采取了严肃的态度，也做了一定的努力，仍然难免有失之偏颇和不够精当之处。尤其是书中对古代语言的诠释和表述，更会有许多言不及义，或不够通俗、明了的地方，尚望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解放军出版社范传新等同志的热情鼓励与帮助。全书完稿之后，年逾古稀的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郭化若将军，不仅热情地为本书题写书名，而且还亲笔作序。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编著者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兵林拾英》第七集，主要采撷了公元1368年至清末中日甲午战争这段历史时期近百名重要军事人物用人、运**谋**、作战、治军的精彩片断。每个片断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短小精悍，清新隽永，富有哲理，闪耀着智慧之光。读后引人入胜，启人深思，余味无穷；不仅能够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谋略素养，而且可以领略到古代将帅的智慧风采，得到美的享受。

此书不但宜于军人阅读，而且也宜于其他各界人士阅读，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朋友。企业经营管理工作者研读它，对于提高其经营管理艺术亦有裨益。

目 录

以攻制攻 (徐 达)	(1)
丘福之败 (丘 福)	(3)
因敌作势 (朱 棣)	(5)
分则易制 (朱 棣)	(7)
分进合击 (张 经)	(9)
练兵御倭 (戚继光)	(11)
并力合势 (胡宗宪)	(12)
智勇争奋 (谭 纶)	(14)
不泥于法 (戚继光)	(16)
审机进退 (努尔哈赤)	(18)
以勇制胜 (努尔哈赤)	(20)
以赏示信 (努尔哈赤)	(22)
佯为互市 (努尔哈赤)	(24)
临事机变 (努尔哈赤)	(25)
务在激气 (努尔哈赤)	(27)
先败其一 (努尔哈赤)	(29)
矢镞侦敌 (努尔哈赤)	(32)
斗智为上 (努尔哈赤)	(34)
坚守进逼 (熊廷弼)	(36)
重在选练 (徐光启)	(38)
浪言玩兵 (王化贞)	(39)
当重将权 (孙承宗)	(41)

守而后战（袁崇焕）	(43)
大言求宠（王化贞）	(45)
刺血为书（袁崇焕）	(47)
谨慎择贤（努尔哈赤）	(48)
“自固”之策（皇太极）	(50)
便宜行事（皇太极）	(52)
调虎离山（皇太极）	(54)
守土为上（袁崇焕）	(56)
首在得人（范文程）	(58)
执法立威（皇太极）	(60)
勿贪财物（皇太极）	(62)
开诚直言（皇太极）	(64)
败中求胜（张献忠）	(65)
扬言驱敌（皇太极）	(67)
以走制敌（张献忠）	(69)
围点打援（皇太极）	(71)
佯渡诱敌（李自成）	(73)
舍强击弱（李自成）	(75)
弃金诱敌（李自成）	(77)
先弱后强（李自成）	(79)
农务为急（多 铎）	(80)
市义沽名（顺治帝福临）	(82)
失于轻敌（李自成）	(84)
详察敌情（郑成功）	(86)
善取潮汐（郑成功）	(88)
恩威并用（康熙帝玄烨）	(90)
因敌作势（费扬古）	(93)

左右合击（康熙帝玄烨）	（96）
败于无谋（傅尔丹）	（98）
乘敌不备（策 凌）	（100）
善择战机（乾隆帝弘历）	（102）
不审真伪者败（玉 保）	（104）
敌疲则打（姚之富）	（106）
以守为战（林则徐）	（108）
柔远误机（琦 善）	（110）
坚壁待援（姚怀祥）	（112）
以长击短（韦绍光）	（114）
小可敌大（俞家庄渔民）	（116）
师夷长技（魏 源）	（118）
先知后图（姚 莹）	（120）
专意金陵（洪秀全）	（122）
穴地攻城（胡以晃）	（124）
忠义血性（曾国藩）	（126）
“四斩”之律（刘丽川）	（128）
事权宜专（曾国藩）	（130）
偏师则北（杨秀清）	（132）
联船锁江（石达开）	（134）
因粮于敌（秦日纲）	（135）
昏瞶自矜（叶名琛）	（137）
溃而不追（张乐行）	（139）
指导之失（杨秀清）	（141）
会盟反清（张乐行）	（143）
订约会战（李秀成）	（145）
哀兵必胜（僧格林沁）	（148）

孤军犯险 (李续宾)	(150)
痛除客气 (曾国藩)	(152)
植帜设疑 (李秀成)	(154)
力攻其背 (洪仁玕)	(156)
不求速效 (袁甲三)	(158)
久远之图 (李鸿章)	(160)
易步为骑 (赖文光)	(162)
以静制动 (曾国藩)	(163)
聚兵防河 (曾国藩)	(165)
不急言战 (曾国藩)	(167)
诱敌入网 (张宗禹)	(169)
扼地围剿 (李鸿章)	(171)
觅地兜围 (李鸿章)	(173)
蔽边御侮 (刘永福)	(175)
缓进急战 (左宗棠)	(177)
先为筹及 (左宗棠)	(179)
委婉用机 (曾纪泽)	(180)
以劣制优 (刘永福)	(182)
沉船阻敌 (欧阳利见)	(184)
先发制敌 (冯子材)	(186)
出奇见功 (冯子材)	(188)
练兵求强 (奕 訢)	(190)
富强并重 (丁日昌)	(192)
避战自保 (李鸿章)	(194)
弃地邀赏 (叶志超)	(196)
力疾血战 (左宝贵)	(198)
保船制敌 (李鸿章)	(200)

掩袭空虚（聂士成）	(202)
攻非其时（吴大澂）	(204)
兵事焉能相约（依克唐阿）	(207)
株守待毙（魏光燾）	(209)
自弃险要（徐邦道）	(211)
因时而变（郑观应）	(213)
甘守固陋者省（郑观应）	(214)
前事之师可鉴（李鸿章）	(217)
附：中国历史年代总表	(219)

以 攻 制 攻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徐达、常遇春奉命率军北上攻击元军。徐达等根据朱元璋的战略意图，精心运筹，挥师挺进，所向披靡，很快就攻占了山东、河南的大片地区，并西克潼关，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接着，水陆并进，直趋元都。明军渡过黄河后，日夜兼程，向北进攻。是年八月，在河西务（今河北武清北）大败元军，随后便攻克通州（今北京通县）。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木儿），见大势已去，无力抵御，便慌忙带领一部人马和后妃、太子等逃出京城，奔往开平（今内蒙多伦西北）。徐达等顺利地攻占了元大都（今北京市），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至此而亡。

太祖朱元璋得到捷报后，遂下诏改元大都为北平府，指派都督孙兴祖驻守北平，命徐达、常遇春等继续向山西进军。是年九月，常遇春取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十月，冯宗异、汤和由河南渡河北进，攻占武陟等地，进入山西，又克泽州（今山西晋城市）、潞州（今山西长治市）。这时，元太原守将扩廓帖木儿（又称王保保），在大败汤和军后，又率军出雁门关，经保安（今河北涿鹿），企图入至居庸关，进袭北京。扩廓帖木儿在多路元军节节败退，京城失守，偏居一隅的困境下，尚能大败汤和，并向北平进军，这就不能不使徐达等在是进军山西、还是据守北平的问题上，作出慎重抉择。徐达在认真分析了敌情之后，果断地对部属们说：“扩廓远出，太原必然空虚。北平有孙都

督防守，可保万全，不必多虑。当今应当以攻制攻，直捣太原，使敌进不得战，退无所守，此乃批亢捣虚之策。如果扩廓回师太原，我正好以逸待劳，一战而胜。”众将都赞成这种分析和认识，遂挥师大进，继续向太原进军。

扩廓帖木儿进至保安，获悉明军直趋太原的消息，只好回师救援。途中遭到明军的阻截，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这时，常遇春向徐达建议说：“我军只是骑兵到此，步兵尚未跟上，如果立即正面交战，彼众我寡，必然造成很大伤亡。不如乘夜袭击元军营寨，打他个措手不及。”徐达深以为是。当他们正调兵遣将，准备实施夜袭时，突然有人报告：“扩廓部将豁鼻马派人前来约降，并愿作内应。”徐达等随即派人去同豁鼻马取得联系，同时命令一部轻骑，乘夜衔枚疾进，袭击元军。天近二更，扩廓帖木儿正独坐军帐，考虑如何摆脱明军阻击，回师太原的问题，忽然帐外人喊马嘶，杀声震耳。他向外一看，只见军营中火光冲天，一派混乱，大队明军已冲入营寨。他一时失去了主意，不知如何处置为妥，仓猝间，他赤着脚跳上一匹瘦马，带着十八名亲随人员落荒而逃。豁鼻马在扩廓奔逃后，率其所部四万多人马向明军投降。徐达等乘胜追击，兵临太原城下，元守军弃城而逃，太原遂为明军攻占。

在向太原进军的作战中，徐达从当时的战争全局出发，不为元军的来犯所左右，采取以攻制攻之术，变被动为主动，以小的代价取得了大的胜利。徐达的这种驾驭战争的艺术，与孙臆的“围魏救赵”有异曲同工之妙，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以攻制攻的运用，需要人们从全局出发，科学地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的。

丘 福 之 败

明成祖（朱棣）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六月，逃居塞北的鞑靼主本雅失里，杀害了明使郭骥。成祖以此为由，下令北部边将和兀哈良三卫加强边防守卫，同时从山西、山东、辽东等卫所抽调大批步骑，进驻兴和、北京，待命北征。七月三日，命洪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武城侯王聪为左副将军，同安侯火真为右副将军，靖安侯王忠为左参将，安平侯李远为右参将，率“精骑十万”，出塞北征。

大军出发前，明成祖朱棣虑丘福轻敌，特意告诫说，兵事须慎重，自开平（其地在今内蒙多伦地区）以北虽不见敌，应时时如临敌，“日夜严谨瞭备，敌至则出奇兵以击之”。并要求丘福“毋失机，毋轻犯，毋为所给（欺骗）。一举未捷，俟再举，尔等慎之”。待丘福率师北进之后，朱棣又连下诏令，反复申戒丘福要慎重战事，不可轻信“军中有言轻敌易取者”。就是说，不能轻信那些关于敌军容易打败的言论。

八月，丘福等率军经开平出塞。他自己亲率千余骑先行，当进至胘胸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克鲁伦河）一带，与元军的游兵遭遇。丘福挥师迎战，将其击败，遂乘胜渡河，又俘获了鞑靼尚书一名。丘福向其询问鞑靼主本雅失里的去向，因为这位尚书本为鞑靼人派出侦察明军情况的间谍，便编造说，本雅失里闻大军南来，便惶恐北遁，现

距此不过三十里。丘福听了便信以为真，遂决定率先头部队“疾驰擒之”。诸将都不同意丘福的这一决定，建议“俟诸军集，侦虚实而后进。”但是，丘福却坚持己见，拒不采纳此策。他以元尚书为向导，率部直袭敌营，连战两日，鞑靼军每战总是佯北而走。这就更加助长了丘福的轻敌思想。丘福一心想生擒本雅失里，遂孤军猛追。这时，右参将李远提醒说：“将军轻信谍者，径渡河悬孤军至此，虏故示弱给我深入，进必不利。”并分析当时的情况提出“今退则为虏所乘，莫若结营自固。昼则扬旗伐鼓，特出奇兵与挑战；夜则多燃炬鸣炮，以张军势，使虏莫测。二日内，我军毕至，并力攻之必利，不然也可全师而还。然尤防虏设伏，要（邀击）我归路。”左副将军王聪也力劝丘福不可轻敌冒进。李远等人的分析和认识，不仅揭示了鞑靼军诱敌深入的企图，而且提出了或战或守之具体措施。但是，丘福却听不进去，一意孤行，并下令说：“不从命者斩！”遂即率骑先驰，诸将也不得不率部跟进。不久，鞑靼大军突至，将丘福所率先头部队重重包围。王聪率五百骑突围时战死，丘福与火真、王忠、李远皆被俘而死。在丘福所部被鞑靼军围歼之后，明后续部队皆不战而“驰还”。

胘胸河之战，丘福以十万装备精良的骑兵，进攻穷蹙于克鲁伦河一带的本雅失里残部，竟至于前锋被歼，后续部队未战而逃。明军这次失败的原因，完全是丘福的急功近利，主观武断，刚愎自信，不听劝阻造成的。丘福之败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潜心体味，一定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因 敌 作 势

明成祖朱棣于丘福北征失败后，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至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的十五年里，先后五次率大军亲征，在军事上取得了不少胜利，也表现了这位封建皇帝的军事才能，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总结。

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明成祖朱棣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充分准备之后，决意率军亲征鞑靼。他于二月一日下诏，命其长子朱瞻基留守北京，户部尚书夏原吉辅政，并令翰林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随行。二月四日下出征诏书，在分析明军必胜之道时指出有五条理由，即“大击小，顺取逆，治攻乱，逸待劳，悦吊怨”。他的具体部署是：以静远侯王友督中军，安远侯柳升为副；宁远侯何福，武安侯郑亨督左、右哨；宁阳侯陈懋、广恩伯刘才督左、右掖；以上合称五军营。以都督刘江等为游击将军率前锋，以都督薛禄、冀节等为骠骑将军，都指挥侯镛、陈智等为神机将军，都督金玉等为鹰扬将军，都指挥李文等为轻车将军，各率所部跟进，随时策应五军营作战，总兵力号称五十万人。

二月十日，明军从北京浩浩荡荡向北开进，于二十五日进至兴和。此时，本雅失里闻明大军北进，非常恐慌，想与其知院阿鲁台一起向西转移，阿鲁台不从，鞑靼内部便发生分裂，本雅失里率众西走，阿鲁台则向东去，以远避明军。

明军在兴和经过短暂休整后，继续北进，于五月十三

日，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南岸，将本雅失里追及。本雅失里率部抵抗，朱棣登山布阵，挥军奋击，“一呼而败之”。本雅失里“仓惶穷迫”，丢弃辎重畜产，仅以七骑渡河北逃。明军俘获鞑靼贵族把秃帖木儿等男女百余人。朱棣命将所俘人口全部释放，并资给粮食、牲畜等，同时又命王友等招降余众，给予安抚。

在取得对本雅失里的作战胜利后，朱棣决定立即移兵东攻阿鲁台。五月二十日，朱棣命令以骑兵沿牂牁河东进，经阔滦海（今黑龙江的呼伦湖）向北，于十月八日进抵斡难河东北方向的飞云壑，侦知“阿鲁台聚众前山谷中”。朱棣就率数十骑登高观察后，即挥军过山，“结阵而行，左右相距数十里”，向阿鲁台部进逼。阿鲁台面对明军的进攻，曾有求降之意。朱棣恐其有诈，便令诸将严阵以待。后阿鲁台因部众主战、主和意见不一而犹豫不决，朱棣鉴于此情，当机立断，即挥师大进，直冲鞑靼营阵，杀伤甚众，大败其军，阿鲁台携家眷仓惶向北逃走，明军乘胜追击百余里，因时值炎夏季节，明军缺粮、缺水，将士多病，朱棣便下命令全军停止追击，凯旋而归。

这次斡难河之战，是朱棣的第一次北征。他在用兵上注意“因敌作势”，首先集中兵力进击西走的本雅失里，尔后转兵东向，击败阿鲁台，收到了各个击破的积极效果。朱棣的这个“因敌作势”，包含着丰富的军事哲理，值得我们潜心体会。

分 则 易 制

明成祖（朱棣）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三月，鞑靼部首领阿鲁台乘瓦剌（首领马哈木）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温都尔罕地区）败于明军之际，率兵击败瓦剌，鞑靼部力量日渐强盛，并逐步控制了游牧于今我国内蒙朵颜山一带的兀良哈部。鞑靼部力量转强之后，又开始同明朝对抗，不仅经常谩侮、拘留明朝使臣，还不断地南进骚扰明朝边塞重镇。对此，明成祖一面增加兴和、开平、大同等地的守备力量，一面转而拉拢和扶植瓦剌势力以对付鞑靼。

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三月十八日，阿鲁台率鞑靼军攻陷兴和，杀死明守将、都指挥使王焕。三月二十日，明成祖命皇太子监政，自己亲率大军北征，企图长驱漠北，直捣鞑靼腹心。当明军进至鸡鸣山（今河北怀来西北）一带时，阿鲁台闻讯，乘夜撤离兴和而北遁。当时，诸将建议立即派兵追击，但成祖帝认为，追之徒劳，待草青马肥，经开平，逾应昌（今辽宁克什克腾旗西），出其不意，直抵阿鲁台腹地，破之未晚。他没有采纳诸将的建议。四月十五日，明军进击龙门（今河北宣化东北），缴获鞑靼兵仓惶逃遁时丢下的战马两千余匹。六月七日，明军进至应昌。成祖帝鉴于应昌以北“地益平旷”，命诸军“结方阵而进，神机、马队必须序列整肃，不得搀错”，行军队形前后左右要严密警戒，以防阿鲁台军的袭击。

这时，明军获悉鞑靼兵进袭万全，诸将纷纷提出分兵